



扫二维码，
关注草地周刊

藏族学生和他们的“南通爸妈”

■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朱旭东

“刚开始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也很孤独。”德庆卓嘎，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乃东县，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西藏读的，去年考上南通西藏民族中学，今年已是高二了。刚到南通时的那种孤独感，他不会忘记。

“有烦恼的时候，我就自娱自乐，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睡觉。第一次与南通市民结对时，很尴尬，过了两三个月才慢慢适应。”初二(1)班的平措卓嘎，来自西藏拉萨。

在长江入海口的江海平原上，生活着一群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孩子，他们都在 12 至 18 岁之间，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距家乡四千多公里之外的南通求学。孤独感，如影随形。

多数孩子，会慢慢适应在南通的学习生活，但总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会通过特别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幸运的是，异地他乡有一群专业“守护神”，不仅辛勤地教授他们知识，还在生活中为他们遮风挡雨，帮他们度过心理叛逆期，像父母一样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世。

他乡求学

10 年后接到瘫痪妈妈电话后，格桑变了个人似的，再也不“野”了

初二(1)班的格桑(化名)，来自拉萨林芝，是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780 名学生中的一员，曾经是有名的“刺儿头”。

去年 8 月 24 日，班主任陆娟到上海火车站接西藏新生，其他学生都接到了，偏偏少了格桑。陆娟以为格桑没来，到学校一看，格桑背着一把与自己个头差不多高的吉他，正站在学校门口张望。没人知道她是如何从上海到南通的。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于 1997 年 7 月创办，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1994 年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精神创办的，时为华东地区唯一一所教育援藏的完全中学。学校现有 8 个初中班级，12 个高中班级。陆娟是 106 名教师中的一员。

军训期间，陆娟发现格桑“比较野”，根本不听教官的话，想怎样就怎样。教官说她动作不规范，她就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我身体不舒服，我退出。”

“退就退，不能让这种风气蔓延。”陆娟与教官商量后，让格桑在一边休息。陆娟借机找格桑谈心，直觉她来自单亲家庭。

原来，格桑出生两个月后妈妈就“走了”，她是由姑姑带大的。至于这“走了”到底什么意思，陆娟当时不敢问。姑姑出嫁后有了孩子后，格桑再次回到父亲身边，小小年纪就承担起所有家务活。“爸爸在外面喝醉了，我就开车把他带回家。”

“老师，我为什么野？我疯狂的时候，就能忘掉拉萨的一幕幕。所以我要野，要与男生打闹。”陆娟的耐心，让孩子打开了心扉，“爸爸说，妈妈死了，但我五年级的时候，有人找到我，告诉我妈妈还在，但需要换肾。六年级时，又没妈妈消息了。我一直没见过妈妈，爸爸也没有再成家。”那时候，陆娟只是一名倾听者，不便多问。

格桑并没有因为那次谈话而改变什么，依然不断犯错。陆娟反复努力与她父亲沟通，希望他“别将大人的事情强加于孩子身上，并帮格桑找到与母亲的联系方式”。终于有一天，格桑的母亲主动打电话到学校，告诉格桑，她已成家，只是多年瘫痪在床。“13 岁的格桑接到电话时，一直在哭。”陆娟非常感慨，“妈妈瘫痪在床，肯定不是件好消息，但格桑一直在笑，因为她终于找到妈妈了。”

从那日起，格桑向老师保证，一定要好好学习。接到妈妈电话后，格桑变了个人似的，再也不“野”了，开始有心事了。“格桑主要在牵挂她生病的妈妈。”陆娟说，孩子这段时间变化很大，因为 10 多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不管妈妈贫与富、健康与否，妈妈在，就是最大的安慰。格桑不用再去纠结了，开始努力安心学习，尽管至今母女俩还没见过面。

“南通爸妈”

讲起家乡的事，扎西会两眼放光，神采奕奕。我把这些告诉他西藏的父母时，他们也很奇怪，孩子怎么有那么多话讲

3 年前，一名初中男生突然跑到南通西藏民族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顾宙那里哭着说：“顾校，你能不能抱抱我？”这件事对南通西藏民族中学的管理者触动很大——孩子们太渴望亲情了，而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他们意识到，学校不仅要帮孩子获得好的学习成绩，还得想办法让他们在南通有个“家”。

早在 2008 年，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就开展了“关爱高原雏鹰”的师生亲情结对，但老师平时都很忙，根本无法照顾到那么多藏族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和和平桥街道和社区开展“包元宵 制花灯 促团圆”主题活动，邀请南通中学西藏班的藏族学生和社区夕阳红志愿者、小学生共迎元宵佳节。(资料照片)

学生。2012 年，南通市委宣传部等 6 部门联合发文，在南通市区开展“我在南通有个家”——“藏汉亲情牵手”志愿者活动，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招募藏族学生的志愿者家庭。活动得到了南通市民的积极响应，从那年开始，每个新到南通的藏族孩子，都有了“南通爸妈”。

南通田家炳中学的学生家长，几乎承包了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初一新生“南通爸妈”的角色。“学校提醒，这是公益活动，家长必须与自家孩子考虑清楚，而且不建议单亲家庭参加。”

葛伟华和西藏民族中学初一(1)班的巨增贡觉结了对子。结对后，葛伟华很快与巨增贡觉的家长取得联系，问对方希望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对方以为葛伟华是骗子，直到通过手机将孩子的照片发过去，对方才感动得无语伦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孩子在南通还有“家长”。

巨增贡觉刚开始不好意思叫葛伟华为爸爸，一直称呼他“叔叔”，直到双方父母见面，孩子的父亲鼓励巨增贡觉叫“葛爸”。“孩子在葛爸、葛爸，叫得可欢了。”葛伟华开心地说。

陈培，南通市兴业银行的员工，她结对的孩子的名字叫扎西平措，成绩比较好，比较内向，刚开始的交流对陈培而言，几乎都是单向的。但只要讲到西藏的事，比如说起牦牛、草原，扎西就会滔滔不绝，那时候，陈培只有倾听的份。

为了引导孩子开口说话，陈培找来地图，鼓励扎西平措指着地图讲自己的故事。扎西平措说，他外婆家住在尼泊尔对面，要穿过一片森林才能到达，而河对岸就是尼泊尔军营；放假去林芝的奶奶家，要开 7 个小时车，翻过几座山；叔叔是牧民，家里有好多好多的牦牛……“讲起家乡的事，扎西会两眼放光，神采奕奕。我把这些告诉他西藏的父母时，他们也很奇怪，孩子怎么有那么多话讲。”

刚开始，听说扎西平措喜欢吃螃蟹，陈培让爱人买了好多大闸蟹，结果孩子吃了以后身体不舒服，却不吭声，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事后才知道，扎西平措喜欢吃的螃蟹是那种香辣海蟹，并不是江苏人喜欢吃的大闸蟹。从那以后，陈培特别注意扎西平措的饮食。“他们喜欢吃水煮牛肉等四川口味的、辣一点的。”为了让孩子有家的感觉，陈培不主张带扎西平措到饭店改善伙食，而是努力在家做孩子喜欢吃的口味。

生死相报

施乃平犹记在西藏一次遇险后醒来所见：黑黝黝的土石墙、一盏酥油灯和三个微笑的藏民

天是“朗”，地是“撒”，吃饭叫“可拉萨”。一见面，施乃平就读了记者几个简单的藏语词汇。他曾经是援藏干部，担任过隆子县新巴区的区委书记，后来又任扎朗

县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回南通后，担任南通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后来，他接到任务，于 1997 年在南通创办了西藏民族中学。

1999 年，学生仁增加措高烧不退，屁股上的肌肉开始腐烂，人迅速消瘦，住院一个月也毫无见效，施乃平急得手足无措。医院已连发两次病危通知书，他只能电话通知孩子的家长到南通来。孩子患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非常凶险，主治医生已经用了最好的抗生素。施乃平恳求医院邀请上海专家前来会诊，费用由学校承担。没想到，上海专家来后，换了一种抗生素，一周后症状即缓解，一个月后，孩子出院了。回西藏疗养前，仁增加措的父亲，跪在地上向施乃平敬献哈达。

“我的生命，也是藏族同胞救回来的。”施乃平说。原来，1984 年的时候，施乃平担任隆子县新巴区委书记第 3 年，因学会了日常交流的藏语，他便一人骑马下乡指导农牧业生产。路过一个峡谷时，马受身后汽车喇叭声惊吓，施乃平连人带马摔下峡谷，醒来时发现躺在藏民家中，浑身疼痛。

黑黝黝的土石墙，一盏酥油灯，三个微笑的藏民，这是施乃平醒来后的第一视觉。原来，一个打猎的藏族小伙子发现了昏迷的施乃平，就把他背回家，小伙子的父亲普布请来藏医帮他疗伤。施乃平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藏医留着短白胡子，而且是用唾沫在手掌上和药，然后在他疼痛处擦抹。药里面有麝香，能帮助缓解疼痛。“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在普布家躺了 3 天，区里才用马车把我接回去。”

施乃平说，藏族的孩子在南通，最易发生三种疾病：骨折、感冒、肺结核。2005 年春天，一位名叫次旺的初二学生突发“空调性肺结核”，夜里他和另外一名老师将孩子从人民医院转到乡下的肺科医院。从车上往下抬病人时，孩子一口鲜血喷出来，正喷在两人身上。当时他们根本没考虑到传染性，只担心孩子的病情。医生连忙安慰，说能治愈。次日，施乃平特意在孩子的骨头汤中，添加了冬虫夏草，希望孩子早日康复。“结核病在南通地区早就绝迹了，但学校的多名老师，属于结核病携带者，都是被学生传染的。”

在南通教师和西藏孩子的努力下，南通中学西藏班已毕业的 270 人中，几乎全部考上重点本科，还产生过 7 名江苏省藏籍高考状元；南通西藏民族中学的中考成绩连续 10 年位居内地西藏学校的全国第一，高中毕业生 98% 升入内地本科院校，共产生 2600 多名大学生。

照顾他人

要让藏族孩子知道，这里也有需要他们帮助的人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宿舍内干净整洁，房间里四张高低床，一般住 6 至 7 人，统一的蓝色蚊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每张床下，都有十多双各式运动鞋。多数宿舍门口

挂着洁白的哈达，有的孩子还在自己床头上哈达。

藏族与汉族的饮食习惯差异很大，学校为孩子们饮食，也想尽办法。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学生处主任达斌说，南通西藏民族中学从建校到 2005 年，一直采取配餐制，孩子们吃的都一样，所有的饭菜做好摆放在桌上。后来发现有的菜孩子不愿意吃，而初中生与高中生学习时间不一样，饭菜冷热很难保证。

“刚开始，孩子们喜欢吃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比如油炸炸鸡，南通孩子都喜欢吃，但藏族孩子不吃；烩鱼片、剁椒鱼、肉丸，汉族的孩子都喜欢，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喜欢吃椒盐大骨头、盐焗鸡等。他们不爱吃素菜，我们就通过健康教育宣传，引导他们吃素菜，均衡饮食。”达斌还经常通过后勤部、生活部向学生们征求意见，根据孩子们的需求来调整菜品，逐渐取得了平衡。

为了配合藏族学生的口味，南通中学还专门从西藏购买咖喱粉、孜然粉、干辣椒等调味品，同时派厨师学习川菜、藏菜的做法。每到藏历新年，学校专门为藏族学生准备“古哪”，将牛肉丁、萝卜丝和牦牛骨放在一起熬汤，食堂师傅将各种不同的吉祥物包在面团里，混入汤中，吃到不同的东西，代表不同的寓意。

“很多人认为，这些藏族孩子，在南通是被照顾的，是弱小的。如果仅仅如此，对他们的人格健全将非常不利。”南通西藏民族中学校长杨小凡说，“他们是在异地求学，远离父母，但他们同样可以为社会作贡献，我们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努力去关心其他更需要帮助的群体。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建立更健全的人格。”

于是，重阳节看望老人，节假日帮助交善维持秩序，便成了藏族孩子的必修课。10 月 17 日，周六，记者随南通西藏民族中学的 16 名学生，前往如东县大同村看望那里的留守儿童，这是民族中学的藏族孩子第 86 次前去联谊。阳光明媚，的确是一次难得的远足，但对 16 位藏族学生来说，他们还要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功课，进行才艺表演。

“我要让藏族孩子知道，这里也有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并不是弱小的，社会也需要他们的关爱。”老校长施乃平，退休后依然积极参与南通西藏民族中学的活动。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藏族孩子常年在外，无疑是他们父母最大的牵挂。在南通西藏民族中学采访时，记者正好碰上一位藏族孩子的母亲，杨金玉，回族，她的儿子努海啦，今年 13 岁，上初一。努海啦第一次远离家乡，因此杨金玉特意跟了过来照顾一段时间。“我来一个多月了，孩子已经慢慢适应了，我准备回去了。”杨金玉说，她对这边的教学质量从来不担心，就担心孩子孤独。“这边学习抓得很紧，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孩子现在吃点苦，我们还能看到帮到，现在多吃苦，以后工作才会少吃苦。人在世上，哪有不吃苦的。我们陪不了他一辈子，迟早要放手的。”

大山里的“直过民族”

■新华社摄影部记者王全超

9 月下旬，新华社全媒体报道平台组织多媒体调研小分队，深入位于西南部的基诺山区、布朗山区、瑶族山区，我们这次调研的对象很有意思——“直过民族”。

“直过民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中的特殊成员。他们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一夜之间”跨越了其他民族上千年的历程。

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过”得好吗？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在他们与现代生活接轨的进程中，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带着诸多好奇和疑问，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区的洛特老寨，探访那里的“直过民族”——1979 年被确认为我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的基诺族。

洛特老寨共有 34 户 150 余名基诺族人，寨子里随处可见晾晒的茶叶。在一处空地上，六七名妇女一边分拣茶叶，一边听着手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在村民车基的木房子里，洗衣机、电冰箱、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打开冰箱，里面冷冻着猪肉和罐头。在洛特老寨，绝大多数村民家中都有手机、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有些人还买了小汽车。

很难想象，在几十年前，这里的群众还过着原始部落刀耕火种的生活。“七月砍树、八月烧山、九月犁地，来年开春种上早稻、苞谷……”81 岁的基诺族老人沙白至今对过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记忆犹新。

基诺山从前主要靠野生古茶树产茶，很少人工种植。2000 年初，基诺山被列为国家民委、国家扶贫办“两山”扶贫综合开发项目，此后又被列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综合扶贫开发、富民兴边等项目。

经过 14 年多形式、不间断的扶贫开发，山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诺族群众的钱包鼓了起来，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0 年的 800 元增加到去年的 9308 元，增长 1064%。

基诺族正在与外界深度融合。只念过小学的基诺族妇女车基，最大的梦想是让现在仅 3 岁的女儿将来能读大学。她认为，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基诺乡巴朵村“80 后”姑娘车基都在昆明上职高，又在北京自考了大学，接着在北京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回到了家乡。她被寨子里的乡亲们选为妇女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刺绣合作社。她梦想有一天，基诺族的刺绣也能申请非遗。

一山一世界，几十公里外的布朗山乡曼因村曼班三队却是另一番景象。

连接曼班三队与外界的唯一通道，是一条通往曼因村委会的土路，十几公里长，狭窄崎岖，长期无人管护，几乎要被齐人高的杂草吞没了。记者到村委会出发，颠簸了约一个小时，才见到那十几栋吊脚木屋。听到声响，村民纷纷奔到屋外观望。有的孩子藏在木房后，瞪大双眼，好奇地看着到访的陌生人。

与基诺族相比，曼班三队的拉祜族村民融入现代生活的速度慢了许多。村民们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大多对年龄和时间没什么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曼班三队有 17 户 63 名拉祜族人，从前生活在偏远深山里。2004 年，当地政府想让村民们搬出来，特意选址在乡村公路边为他们修建了新的木屋。可村民一是嫌新房离田地太远，干农活不方便，二是觉得新房子是石棉瓦屋顶，夏天住在里面太热，住了没多久又悄悄搬回深山里。

2010 年，政府又在离村寨原址较远的地方为村民拉通水电、修建木屋，还给家家户户装上了太阳能，村民们才陆续搬出来。

记者到访的那天，正值拉祜族传统的新米节。他们请来其他寨子的亲朋好友一起庆祝。村组长扎康光着膀子，赤脚蹲在火塘边炒菜，土蜂蛹是他从山上采摘的佳肴。拉祜族小伙子正在切牛肉，扎丫告诉记者，牛肉是寨子里统一分给每户的，他觉得这种分配方式很公平。

曼班三队全寨至今没人小学毕业。2011 年，这里曾设过教学点，一名老师教 10 多个孩子。如今教学点撤并了，孩子们也全部辍了学。

广西南丹县里湖乡是“中国白裤瑶之乡”。这里的“直过民族”——白裤瑶族，也在为“脱贫”努力着：“一些人开始走出大山打工，接触外面的世界，但‘脱贫’之路依旧漫长。”

记者到访的黎英翠家 5 口人，大姐在外打工，家里住着爸爸、妈妈、妹妹和她四口人。因为路费很贵，姐姐外出打工一年，一次都没有回来。姐姐就像是她的眼睛，替她看着外面的世界。黎英翠今年 11 岁，在当地的怀里小学上五年级，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当记者问她目标是上哪所中学时，她却说自己打算上完小学就出去打工挣钱，为家庭分忧。黎英翠的妹妹黎英对今年 7 岁，还没有入学，记者到她家时，英对正坐在门前喝粥，这就是她的午餐。

这次调研采访中所接触到的“直过民族”群众，只是我国“直过民族”中的一小部分，但透过他们的故事和生存现状，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与现代生活接轨的进程中，每个“直过民族”都经历着经济、文化、社会的碰撞与变革，有快乐幸福，也有艰辛苦难。